

471041

高明士 著

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

東昇出版事業公司

高明士著

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

東昇出版事業公司

著者簡歷

高 明 士

民國29 (1940) 年 出生於臺中清水

民國54 (1965) 年 畢業於臺灣大學歷史學系

現 在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

專 攻 隋唐史、東亞古代史

著 作 『日本古代學校教育的興衰與中國的關係』 (1977年)

「唐代的釋奠禮制及其在教育上的意義」 (1980年)、「中國文化與東亞世界」 (1981年)、「中華民國における中國教育史の研究」 (1979年) 等論文多篇

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

著 者	高 明 士
出 版 者	東 昇 出 版 事 業 有 限 公 司
登記證字號	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 2135 號
發 行 所	國 璽 圖 書 事 業 有 限 公 司
	臺 北 市 敦 化 南 路 669 巷 23 號 4 樓
郵政劃撥	5 4 3 5 3 5 國璽圖書事業有限公司帳戶
	電話：(0 2) 7 0 0 5 7 7 3
定 價	新 台 幣 平 裝 二 〇 〇 元
	精 裝 二 四 〇 元
中 華 民 國	七 十 一 年 二 月 初 版
中 華 民 國	七 十 一 年 九 月 再 版

版 權 所 有 • 翻 印 必 究

再版序

歷史學的研究，不外乎史實與理論的提出，但是各家的研究方法，不免有所偏重，此於日本學界亦然。戰後日本史學界在歷史理論方面，受馬克斯、韋伯學說影響較大，在史實的探討方面，則側重實證主義。近年來，由於中國大陸不斷出土新資料，例如秦簡與吐魯番文書等，對日本史學界衝擊甚大。目前日本對於新出土文獻的解讀，頗有後來居上之勢。基於此故，如何從新出土文獻去印證史書的正確性，已成爲當前史學家研究的迫切課題。易言之，近年來日本史學界對於史料批判的要求，已愈來愈嚴格，實證主義的學風，自然也越來越興盛。此其一。在上述學風的演變下，如拙書所指出，戰後日本史學研究諸主題中，時代區分論戰之問題，到八十年代後已趨於沈寂；但以「實證」的方法，在世界史中將「東亞世界」擺於適當位置，在「東亞世界」史中將日本史擺於適當位置，以矯正歐洲史爲中心的世界史觀，仍然是近年來研究的主題。此其二。近二、三年來，年輕的研究者已顯著地投入史學研究行列。一般說來，每年對於中國史的每一斷代（如秦漢、明清等）研究論文的篇數，約在七、八十篇左右，而年輕的研究者在某些斷代史的研究成果，居然曾經出現占有三分之一的記錄，顯示戰後日本新生代已擡頭。令人驚奇的是從事新出土文獻之解讀、研究者，多半也就是這些年輕的研究者。此其三。以上數點，可說是日

本最近幾年來史學研究新動向的聲聲大者。

戰後日本的史學研究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批判以歐洲史爲中心的史觀。再看鄰近的韓國史學界，自從獨立後，則力求克服日本殖民地史觀以及昔日一些御用學者的論調。日、韓兩國史學界批判的對象，雖然各有所不同，但持以批判態度治學，並無二致，雙方的研究成果，亦皆有可觀。同屬東方的我國，退處台灣以後，三十多年來的研究成果，顯然不能盡令人滿意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，願大家力爭上游，有朝一日使臺北真正成爲國際的漢學中心。

筆者自大學時代起，從事譯述日本史學著作，受益於徐師聖明以及蔡謀成（已故）、蔡榮杰兩位姐夫甚多，謹申謝忱。今拙書再版，適逢故蔡謀成姐夫逝世周年，謹以此書獻於靈前，聊表悼念之情。

高明士 謹識

民國七十一年八月九日

自序

光緒十三（一八八七）年，黃遵憲寫了近代第一本有關日本史的巨著『日本國志』。他在「自敘」裏說明這本書寫作的動機之一，是「日本士夫類能讀中國之書，考中國之事，而中國士夫好談古義，足已自封，於外事不屑措意。」但九年後（一八九六年），梁啟超還有「中國人寡知日本」之歎（『日本國志』後序）。四十一年後，即民國十七（一九二八）年，戴季陶在其名著『日本論』呼籲國人說：「我勸中國人，從今以後，要切切實實的下一個研究日本的功夫。無論怎樣反對他，攻擊他，總而言之，非曉得他不可。」（頁三）宇宙風雜誌在民國二十五（一九三六）年九月十六日出版的第二十五期，也將戴氏的這段話放在封面，作為策勉國人的警句。政府遷臺後，號稱為日本通的陳固亭氏仍「深覺日本人知道我們的太多，我們知道日本的太少，在互相認識上，甚不平衡，殊為憾事。」（石永貴氏序陳著：『日本論叢』語）這些專家的看法，說明近百年來我們對日本的瞭解的確太少。兩次中日戰爭，又加深雙方的民族仇恨，因而國人到現在對日本的理解可說還是相當陌生，遑論心平氣和地欣賞日本了。基於這個認識，筆者於民國六十二（一九七三）年獲得美國哈佛燕京社之資助赴日本進修後，就能力所及也兼留意日本史學界研究的動向，尤其是第二次大戰結束日本史學界脫離軍閥桎梏以後的動向。本書所收諸

篇，便是從六十二年到七十年（一九七三—八一年）近十年間在日本或在臺灣斷斷續續所寫成的。

在「導言」裏，說明日本對中國史的研究，是「東洋史學」最主要的部分，而東洋史學從明治維新以來深受德國正統史學的影響，到今天日本史學界猶有偏重歐洲的傾向。或許由於此故，日人從事史學研究，不論服膺那一種學說，均由最基本的史料研讀開始，這一點很值得我們注意。他們治學嚴謹務實，求知鍥而不捨，這種研究精神，很值得我們學習。

本書的內容，共分三篇：第一篇是談日本對中國史研究的新發展，此新發展分三方面說明：一是批判並克服西方史家對東方所提出「亞洲社會停滯論」的偏見；一是放棄戰前以帝王為中心的史觀，轉而側重以民衆為主體的史觀；一是將中國史納入東亞史或亞洲史、甚至世界史研究。在這三方面當中，筆者側重第一方面的介紹，此即日本史學界對中國史時代區分問題所觸發的筆戰。這場筆戰基本上是以東京大學及京都大學為兩大本營展開，三十年來聚訟紛紜，學派雜多，使日本史學界呈現空前的蓬勃與朝氣。其中肯定唐宋間出現顯著的歷史變革，進而以此一時期作為時代區分的分界線，是日本史學界最早提出，也是戰後日本史學研究最受世界矚目的地方。日本史學界的努力，不論那一學派，均想由時代區分論去證明二千年的中國歷史發展，並非如西方史家所說的「停滯」，甚至要證明在近代（指十九世紀中葉）以前的中國歷史，具有較同時代西方歷史先進的一面。這個論點，對中國人而言，頗具吸引力。第二篇談日本對新舊中國史料研究

的成果，包括日本對秦簡、敦煌學等研究成果的介紹，以及若干日本學術機構所藏重要典籍印行的評介，並附錄拙譯池田溫、岡野誠共著：「敦煌・吐魯番所發現有關唐代法制文獻」一文，此文介紹日本在本世紀以來對敦煌、吐魯番所發現唐代法制文獻的研究史及其文獻的解讀，不論研究唐史或法制史，均是貴重的參考論文。從第一、二篇的說明，可知日本對中國史研究，不但有理論而且有發明，這一切都是先由研讀基本史料入手。因此，史料的解讀，在日人看來可說是史學入門的第一步。第三篇掲載前述諸問題有關的參考文獻目錄，對於初學者當有裨益。

以上是筆者近十年來對日本史學界所作的皮相之論，自知謫陋學淺，但鑑於戴季陶氏「總而言之，非曉得他（日本）不可」的呼籲，勉強爲之，紕繆之處，自所難免，敬請方家指正。

最後非常感謝美國哈佛燕京社的資助，以及摯友黃俊傑兄的鼓勵、顏高生兄的好意，使拙作得以在東昇出版公司出版。

高明士 謹識

民國七十年七月十七日

導言——日本東洋史學的成立與發展

目錄

再版序

自序

導言——日本東洋史學的成立與發展

第一篇 日本對中國史研究的新發展

一、戰後日本對中國史研究的發展

二、中國「古代」下限的時代區分論戰

三、唐宋間歷史變革之時代性質的論戰

第二篇 新舊中國史料的研究成果

一、雲夢秦簡與秦漢史研究

二、敦煌學與隋唐史研究——兼介紹日本新刊兩種有關敦煌學的著作

三、敦煌、吐魯番所發現有關唐代法制文獻（池田溫、岡野誠共著）

四、評介日本最近出版的幾本有關中國史資料

第三篇 相關文獻目錄

目錄

一
一七
一八
一〇四
一七
一一七
一五四
一七六
二三九
二六五

一、有關戰後日本對中國史研究之發展的參考文獻·····	二六七
二、有關中國「古代」下限的時代區分論戰的參考文獻·····	二七〇
三、有關唐宋間歷史變革之時代性質論戰的參考文獻·····	三〇二
四、有關雲夢秦簡的參考文獻·····	三〇八
五、有關敦煌、吐魯番所發現唐代法制文獻的參考文獻·····	三〇八

導言——日本東洋史學的成立與發展

日本近代大學的建置，以東京大學爲最早；東洋史學科的成立，亦以東京大學爲最早。今（一九七七）年正值東京大學創校一百週年紀念，特撰此文，以爲介紹。

一、東洋史學的定義

東洋一詞，在我國通常指日本而言，東洋史則當指日本史。但是日本人所謂的東洋，狹義是指東亞地域，包括中國、朝鮮以及日本在內，也就是通常我們所謂的遠東地域。廣義則包括印度在內的亞洲全部。日本從明治以後，尤其中日甲午戰爭以後，東洋一詞已廣泛地使用。此事一方面象徵日本要作爲亞洲民族之一員的自覺；另一方面則說明日本、中國、印度等地區的文化，是具有獨特性；易言之，此等地區的文化，爲非西洋的特質。東洋史學的成立，就是在日本人這種民族自覺的背景下出現的。

所謂東洋史學，主要是以亞洲歷史爲研究對象的科學。此處之亞洲，並不包括日本。日本史的研究，日本人稱爲國史學。因此，日本人對於歷史學研究的領域，是劃分爲國史學、東洋史

學、西洋史學三部分，這是日本人獨自的發展。（註一）

所謂東洋學，簡而言之，是以亞洲（不包括日本）為研究對象的一種科學。中國學、印度學、蒙古學等均是東洋學的一部分；佛教學、回教學、東洋史學等，也是它的一部分。（註二）

二、東京大學的創建與東洋史學科的成立

東京大學創設於一八七七年（明治十年），較我國北京大學的前身——京師大學堂尚早二十一年（京師大學堂創設於一八九八年）。當時共有文、法、理、醫四個學部。文學部設兩科，第一科為史學、哲學以及政治學；第二科為和漢文學科。史學被列為學科，最早始於此。但是二年之後（一八七九年），史學科被取消。取消的原因，並非無設置的必要，而是日本的史學科與歐美不同，除須講授日本、中國、印度、以及東亞諸國之歷史外，尚須講授歐美的史學。能擔任這種課程的教授，頗不易覓求，學生也稀少，只好關門。史學科被取消後，有關日本史、中國史等課程，改在和漢文學科（即第二科）以及一八八一年（明治十四年）臨時設置的古典講習科講授。

註 一：參看鈴木俊：「東洋史學」，收入『アシア歴史事典』第七卷，頁九五—九六，平凡社，一九六一年初版第一刷，一九七五年初版第九刷。

註 二：參看青木富太郎：「東洋學」，收入前引『アシア歴史事典』第七卷，頁九三。

(註三)

一八八六年(明治十九年)，東京大學易名爲東京帝國大學。是年，仿德國學制，制定各級學校法令。從此以後，外籍教師當中，德籍所佔之比率增大。翌年(一八八七年)，又在文學部設置史學科，並聘請德籍教授利斯(Ludwig Riss)前來講學，主要講授西洋史。利斯氏畢業於柏林大學，主修歷史學，是爲史學大師蘭克的學生。其學位論文，是關於英國中世史的研究。一八八九年(明治二十二年)，東京帝大成立國史科(即日本史學科)，在文學部內與史學科並立。由於兩科之課程相同者不少，且均受利斯氏之指導，以蘭克之學說爲主的德國正統史學，遂在日本紮根。所謂德國正統史學，一方面指注重史料的批判；另一方面亦注重諸史實的相關性(即客觀主義)。同年，在利斯氏的策劃下，成立「史學會」，並發行「史學會雜誌」(一八九二年以後，改稱爲「史學雜誌」)。利斯氏對日本近代史學發展的貢獻，誠不可磨滅。與利斯氏同時在史學科擔任教授者爲坪井九馬三博士。坪井氏曾於一八八七年赴歐洲留學，一八九一年歸國。其治學方法，亦深受蘭克的影響。利斯氏於一九〇二年(明治三十五年)歸國，繼任其教席的是箕作元八博士。箕作氏亦留德，對德國史學之精髓，有深入的研究。

註三：參看中山久四郎：「東洋史學發達の回顧と展望」，頁三八五——三八八，收入『明治以後に於ける歴史學の發達』，歷史教育第七卷第九號臨時增刊號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。

註四：參看坂本太郎：『日本の修史と史學』，頁二四五——二四八，至文堂，一九六六年發行，一九七三年再版。

一八九四年（明治二十七年），那珂通世博士在大學、高等師範學校、高級中學的教授會議上，首次提議將中等學校的外國歷史課程，區分爲西洋歷史與東洋歷史，此議獲得與會者的贊同。「東洋史」之名稱，首見於此。從一八九四年起，在中等學校開始講授東洋史一事，當受中日甲午戰爭的影響。蓋此役日本戰勝後，國民意識高昂，對大陸更加關注，而且有滿清政府的賠款，可充分發展東洋史學的研究（註五）。東洋史講授的內容依那珂氏之意，當以中國史爲主，並包括印度、塞外諸國、西域諸國的興亡，以及中國、突厥、女真、蒙古諸種族的盛衰消長（註六）。那珂氏所以特別強調亞洲諸種族的興衰史，是由於明治二十年代以後人種論甚爲盛行的緣故（註七）。一八九五年，宮本正貫之「東洋歷史」（上、下兩冊）；一八九六年，藤田豐八之「中等教育東洋史」；一八九七年，市村瓚次郎之「東洋史要」；一八九八年，桑原隲藏之「中等東洋史」（上、下二卷）等教科書先後出版，成爲明治以後，「東洋史學」的開路先鋒。但是大學之「東洋史學」的實際開拓者，則爲白鳥庫吉博士。白鳥氏是東京帝國大學史學科第一屆畢業生，也就是利斯所指導的第一期生，白鳥氏於一八九〇年（明治二十三年）畢業後，立即被聘爲學習院教授，與市村瓚次郎教授共同擔任「東洋諸國之歷史」的課程。白鳥氏開始研究蒙古、西域等歷史，

註五：徐先堯師提示。

註六：中山氏：「前引文」，頁三八三。

註七：五井直弘：『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』，頁五二，青木書店，一九七六年。

是在此時。一八九九年（明治三十二年），白鳥氏在羅馬所召開的第十二屆國際東方學者會議上，提出「突厥闕特勤碑銘考」、「匈奴及び東胡諸族の言語考」二篇論文，頗獲國際學者的好評，這是日本學者空前未有的榮譽。一九〇一年，奉派赴歐洲（主要是德國、匈牙利）進修。一九〇二年（明治三十五年），白鳥氏在漢堡所召開的第十三屆國際東方學者會議上，以德文再提出「烏孫考」、「朝鮮古代王號考」二篇論文。翌年年底經由法國、德國、芬蘭、蘇俄等國歸國。一九〇四年八月（明治三十七年），出任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（文學部）新成立的「支那史學科」教授。中國史學科在這一年初次與國史學科，西洋史學科並立爲三。（註八）一九一〇年（明治四十三年），日本吞併朝鮮。翌年（一九一一年）（一說在一九一〇年），日本將東京帝國大學的支那史學科改稱爲東洋史學科，史學科改稱爲西洋史學科（註九）。從此以後，東洋史學科與國史學科、西洋史學科，在史學領域裏，正式形成三分之局。

註八：參看小倉秀彥：「日本における東洋史學の發達」，頁四七八—一八一，收入岩波講座：『世界歴史』，第三十卷，一九七一年第一次發行，一九七五年第二次發行。

註九：中山氏、坂本氏等人均以爲事在一九一一年。參看中山氏：「前引文」，頁三八九；坂本氏：「前引書」，頁二四九。但旗田巍氏、小倉氏、五井氏等人則以爲事在一九一〇年。參看旗田巍氏：「日本における東洋史學の傳統」，頁二八，歷史學研究，二七〇號，一九六二年十一月，小倉氏：「前引文」，頁四八一；五井氏：「前引書」，頁五三。筆者以爲當以前一說爲是。

三、東洋史學的發展

慶應義塾大學橋本增吉教授在一九三二年曾將日本東洋史學的發展，自明治以後區分爲四期（註一〇）。一九六一年，鈴木俊教授於「アジア歴史事典」第七卷「東洋史學」的項目，述及東洋史學的發展時，除接受橋本教授的分期以外，並將一九三二年以後的發展，再分爲兩期，總共是六期。從一九六一年以後到現在爲止，筆者以爲無重大改變。以下就以橋本氏、鈴木氏的分期爲主，再參考其他學者的看法，將日本東洋史學的發展，說明於後。

第一期：明治初期到明治二十三年（一八六八—一九〇年）

此期之歷史學界，仍然維持江戶時代之學風。後世所稱的東洋史學，在此時不過是指中國史研究，也就是漢學研究而已。東京大學的和漢文學科，以及稍後設置的古典講習科是其代表。

第二期：明治二十三年到三十年（一八九〇—一九七年）

此期可謂爲東洋史學發展的準備期。一八八九年，「史學雜誌」開始發行。一八九〇年，白鳥庫吉博士畢業於東京大學史學科。同年，出任學習院教授，講授東洋諸國歷史。一八九四年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，激發日本人作爲亞洲民族之一員的自覺。接着中等學校開始講授「東洋史」，若干東洋史以及中國史教科書陸續發行，惟專門性質的研究成果，在此期尚未出現。

〔註一〇〕橋本增吉：「先秦時代史」，頁三九六，收入前引『明治以後に於ける歴史學の發達』。